

学术综述

省党史学会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 年 9 月 18 日，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省党史学会会长陈焕友、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和省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德宝、钱协寅、黄玉生、桑学成等出席了研讨会。

陈焕友会长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抗战历史研究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要求。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我们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和平正义的坚强决心，宣示了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积极姿态。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为我们坚持正确历史观，把握正确导向，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 70 多篇论文，重点从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创新

南京大学王德宝教授认为，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仅体现在“九·一八”事变以来坚决抗日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上，还体现在抗战中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外交等诸多领域实力的全面对抗。在敌强我弱的严重不对称的战争形态下，中共把中国众多人口，尤其是农民转变成数量占优势的战争人力资源。在敌后根据地建立民选的民主政权、改善民生、动员和武装以农民为主的人民投入保家卫国的抗日斗争，解决了清朝、北洋、国民政府“一盘散沙”的难题，有力地长期消耗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其次，将日军占领的后方变成了战场，日军不仅处处分兵，且在战争的全过程中被迫对国共两军两面作战。再其次，战略层面敌后游击战是军事上的原创，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缴获装备为目的中小型歼灭战为主。第四，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迫使日军只能从其有限的兵力、物力中使用“添油战术”投入敌后战场的慢性消耗中。因此，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游击战的战略是以军事为主以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密切配合的全新的人民战争形式的总体战。

国际关系学院顾永兴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理论创新，不仅对中国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曾起到巨大的历史作用，而且也对我党我军未来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抗日战

争的伟大实践催生了党的理论创新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集中群众智慧、大胆创新、敢于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引抗日战争胜利的一系列理论和战略策略，形成了我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持久战》即是我党抗日战争中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表现。党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吸引了许多爱国官兵，爱国人士积极参加革命，从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科学道路。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创立的重大理论成果，其理论科学性、创新性和预见性，至今令人赞叹不已，闻名于世，成为我党理论创新的经典之作。

省党史工办张衡则从新四军在创新发展方面进行论述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的倡导和带动下，我党我军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创新发展氛围。上自党中央，下到各中央局、各级党组织和部队，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的十年间，特别是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实践，我们党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新四军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谋创新、求发展。初上征程，新四军即以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创新与日军浴血奋战，迅速实现了由红军游击队向抗日劲旅的转变。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军事限共、反共的形势下，新四军别无选择地深入敌后，在江淮河汉的平原水网地区安下了抗日的“家”。新四军以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顽强地坚守了华中抗日阵地，用创新发展的实践，叩开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之门；用政通人和的业绩，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在平原水网地区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科学预见。当战略反攻到来之时，新四军又紧紧地把握历史机遇，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从而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历史地位

南京大字马洪武教授在阐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重大贡献时指出。新四军组建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开赴华中敌后，先后创建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江、鄂豫边和浙东等8块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用枪杆子开辟、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而华中抗日根据地则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了新四军，是新四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基地，二者是相辅相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基地，是驱逐和消灭日本侵略军的重要战场。二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具体实践。三是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战场，并提供了人力和物力的保障。

炮兵学院张进红教授在论述抗战时期解放区战场的历史地位时认为，解放区战场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主战场；是中国人民抗战的精神支柱；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侵略政策；为中国民主革命最后胜利作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在抗日民族战争中，解放区战场实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创立和发展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实施新民主主义政策，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不仅使解放区成为中国人民坚强的抗战基地，而且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验区。解放区的党政军民普遍地经受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和锻炼，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在物质上也作了可靠的保障。到抗战胜利时，农村革命根据地已遍及华北和华南广大地区，初步实现了对城市的包围，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为后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华民族在抗战中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抗战精神”

南京师范大学王跃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精神领袖”，真正体现了“中流砥柱”作用。一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在长达 14 年的中国抗战中，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始终高举抗战旗帜。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团结、民主和进步，清正廉洁、奋发图强，与国民党政权搞分裂、搞磨擦、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精神颓废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吸引了大批爱国学生突破层层封锁投向延安，大批民主人士转向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高尚道德境界逐渐为国统区和敌占区国人所认可，并为后来战胜国民党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解决敌后人民的民生（减租减息等）、不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沦陷区人民的亲切关怀，赢得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壮大到一百多万人。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接玉松对抗战精神鲜明的时代特点作了三点论述，一是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结晶。在抗日战争的洗礼下，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威武不屈、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等优秀品质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挥，并将它上升为无坚不摧的抗战精神。可以说，中国的抗战史，是中华民族在挫折中愈挫愈坚的奋斗史。共产党人在延安继承发扬了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依靠中华民族历史底蕴的薪传，在民族危难时刻凝聚成民族之魂的抗战精神。二是抗战精神开辟了弱国打败强国的新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力量的悬殊对比，决定了中国的抗战必

须发扬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民族团结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国民党许多爱国高级将领身先士卒，奔走呼号，有的血染沙场，有的捐钱捐物，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中国人民开辟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创造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力地打击与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各党各派不计前嫌、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取得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胜利的战争。三是抗战精神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充分显示了民族团结精神。在强敌入侵面前，全国工农商学兵、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各阶级、阶层，各群众团体和海外侨胞，不分阶级、不分信仰，凡是有爱国心的都纷纷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实现了全民族轰轰烈烈的抗战，体现出中华民族高度的凝聚力和强大的向心力。

四、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

南通大学陈志杰教授指出，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作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同时面对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的双重困境，中共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初步建立了边区工业体系。其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受到了边府的重视，它的发展很好地弥补了国营工业力量的有限性，提高了边区人民的生活，促进了边区经济的繁荣，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党和边区政府在调节劳资关系、直接投资、帮助引资、税收优惠等方面的特殊政策，自成体系，富有创造力，推动了私营工业的蓬勃发展，为缓解边区的经济困难，带动边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党和政府对于私营工业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最好的实践支持，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成熟的最好诠释。

省党史工办孙家坤则在总结苏北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指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开展的。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一是制定扶持农业生产的办法和措施。二是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扶植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四是部队在坚持打仗同时，积极开展生产建设。经过根据地党政军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促进了农牧副业和工商贸易的发展，为度过难关，坚持抗战，支援敌后战争，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建设的人才。

（省中共党史学会 张衡）

庆祝扬州建城 250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 年 9 月 28 日，中共扬州市委宣传部、市城庆办公室、市社科联共同举办“古今辉映 开创未来——庆祝扬州建城 25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桂平，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研讨会特邀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周文彰，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复旦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姜义华，原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戴建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兰州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社科联主席陆春鸣等乡贤代表作主题发言。扬州市文化博览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洪军，扬州文化研究会会长赵昌智，原扬州大学副校长、教授周新国以及多位扬州本地知名专家学者等 50 人参加了研讨。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桂平在致辞中指出，学术研讨活动要站在 2500 周年城庆的历史节点上，研究扬州在历史文化、城市精神、经济建设、民众生活、发展方向等各个层面的经验、思路、展望等，探讨当代扬州在名城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这对推动扬州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总体部署，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江苏调研的重要讲话精神，向着“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目标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扬州社科事业发展的成绩和为繁荣全省社科事业做出的贡献，并希望扬州社科界进一步聚焦市委、市政府工作中心，聚焦扬州战略发展大局，聚焦扬州社会民生重点问题，立足扬州做好文章，创造更多有高度、有深度、有热度的高质量思想产品，提出更多专业化、建设性、切合实际、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

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周文彰在发言中认为，当前国内城市的绿化走入了以造景为目的、以画面为审美、以工程为动机的三大误区，导致绿化严重不实，只求好看，不求中用，只管花钱，不管效益，造成了普遍的“有绿无荫”现象。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没有树，人不到的地方就有树。因此亟需转变绿化观，做到实用第一，美化环境，这两点不能颠倒。绿化要以人为本“打造林荫大道”，追求“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并希望扬州能在此方面做出突破。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对扬州城市档案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重视对扬州城市档案的收集，丰富档案的储藏量，为国内外研究扬州的人提供有价值的材料。二是借助当代数码技术，一方面搜集资料，一方面进行数码化，尽可能多的复原档案、复原影像，重视对当代历史的搜集，结合史料与扬州史的研究成果，为后人的研究收集足够的信息。三是收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有关扬州的史料，加强扬州城市史的研究，从诸多小的线索勾连起城市的历史，增加城市的魅力，为扬州城市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机会和可能性，帮助扬州文化在中国、在世界扩大影响。

复旦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姜义华从大数据的角度对扬州文化的发展提出三点想法：一是加强对扬州方言的研究，其对地方文化发展和中国文化研究都有益处。二是用现代的大数据、3D、4D 技术把扬州历史更丰富地展示出来，更多地把历史文化放在民间展示，加大对历史民居、名人故居的建设，用多种形式向国内外进行宣传展示。三是抓住宜居城市的建设，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要体现宜居的文化，比如园林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民俗文化等，让人们得到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需求的满足。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对扬州城市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做好宜居宜游宜创。城市的建设、城市的发展都应当以人为本，为城市居民而建。在宜游方面，需要加大扬州旅游宣传力度。对于宜创，不一定非要搞新的、现代的，也可以把传统做成创新，二是建立城市的认同感，城市居民对城市的自豪感、认同感、归属感十分重要，要认真看待谁在建、为什么建、为谁建的问题，让城市居民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来建设。三是城市的发展要有机的生长，需要一代代的添砖加瓦，而不是推倒重来。要在城市生长的过程中留下生长的痕迹，有魂，有乡愁，有自己的个性。

原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戴建中从旅游发展、城市精神、未来展望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一是扬州要用好用足“运河源头”名片，在旅游推介和品牌推广中更突出扬州的旅游特点和地域标志，依对象不同而做实旅游推介。修建中国大运河标志性建筑和“中国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突出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联系，突出扬州通达四海的开放历史，以推广历史文化不断扩大城市影响。二是振奋扬州人在历史上坚忍不拔、敢于拼搏、决不屈服的城市精神，摒弃小康即安、追求安逸、小聪明和“扬虚子”的作风，为扬州的持续发展注入全新的时代精神。三是认真制定发展规划，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培育基于地方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用现代文化意识来发掘和重新解释，找到现代人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兰州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社科联主席陆春鸣认为，城市的人文特色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城市人文精神培育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新兴的、后起的城市可以在经济增长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无法在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塑造上也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它造就了城市的气质。纵观近 2500 年来扬州城市发展的脉络，扬州人的生活质态，扬州城市的品质总是不断在得到提升，并潜移默化地转变成扬州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成为“扬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扬州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扬州市以传承历史文化，延续城市品质作为城市建设的核心使命，城市面貌顺应时代，顺应文化，顺应民意，彰显着古城独具的时代特色与优势。

与会扬州地方专家学者还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展开研讨：

一是对扬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原扬州大学副校长、教授周新国重点介绍了国家清史工程《清宫扬州御档》，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以及整体汇编印刷出版清宫扬州档案，为社会各界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数据，为扬州奠定了清代史料基础。扬州文化学者朱福炷从邗城的起源认为邗城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吴王夫差之前的邗国，而且并非夫差灭掉邗国后再次筑城，而是指把吴的都城迁于邗。扬州大学教授刘立人则从地名沿革、城址变迁、兴盛大略等三个专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扬州 2500 年的变迁。扬州市文联原主席曹永森从价值系统、陈述系统、行为系统和表现系统等方面剖析了扬州文化结构，提出在扬州文化的躯体内植入现代科学的筋骨，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扬州大学教授黄倬成重点论述了扬州盐业在东西方商业革命中的地位，认为研究扬州盐业经济和盐业文化有利于识别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探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规律，为新时代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借鉴。

二是对扬州城市特质与城市精神的研究。市儒商研究会副会长吴献中认为，以水而兴的三次发展高峰铺垫了扬州的龙马精神；因兵而乱的历次劫难淬炼了扬州的铁血精神；承接南北的地缘优势滋养了扬州融通精神。扬州大学副教授薛平从区位南北、规模大小、历史新旧、文化雅俗、观念上下、性格快慢等六个“反正对”入手，阐述了对扬州城市特质和精神形成原因的理解。市委讲师团副团长丁新伯认为，扬州城市特质的关键词就是“担当”，其形成了扬州最为宝贵的城市文化基因，构建了扬州的精神坐标。扬州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钱学平认为，塑造以“勤奋勤勉、开拓进取、包容通融、崇文尚德”为内容的现代扬州精神，关键在于提升扬州人的精神品格，继承扬州的优秀传统，从每一个扬州市民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起。

三是对扬州文化发展的研究。扬州市文化博览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洪军介绍了 9 年来扬州在打造文化博览城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在传承历史文化，培育城市精神，提高市民素质，增强城市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扬州文化研究会会长赵昌智对扬州建设国际旅游名城提出了解决文化自觉自信，提高文化素养和文明素质，充实景点和活动的人文内涵，深化学术文化，增强文化实力，抢救、培养、引进、使用优秀文化人才等一系列建议。扬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虎华主要对文博城建设提出了统一认识、修订《纲要》、突出重点、健全体制四个建议。扬州市委党校教授王向东建议制定扬州文化资源的分类保护和传承规划，对实物性、艺文性、精神性和商都文化资源采用不同的规划与主题化整合。扬州市语言学会副秘书长李建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扬州文化在世界名城建设中的作用，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把扬州建设成为“人人崇文尚德、家家安居乐业、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创新创造、充满人文关怀”

的幸福城市。

四是对扬州城市发展的研究。扬州大学教授王毅从城市治理角度建议编制扬州城市管理发展规划、理顺扬州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完善扬州城市治理体系、构建扬州城管第三方考评机制，从而提升扬州城管执法与服务水平。扬州市名城研究院院长高永青针对扬州古城保护工作的难点，提出了注重古城保护与世界文化遗产点保护相协调的思路，通过制订行动纲领，编制技术规范，专业资料积累和细节研究，加强古城保护的原真性和专业性。中国名城杂志社副主编王凌宇从住与行入手，对扬州建设宜居城市提出了通过降低居住密度、提供多样住宅来提高居住质量，通过提高道路面积率和路网密度、建设市郊铁路网、近接异质功能点来改善交通环境等建议。

五是对扬州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研究。扬州市委党校教授蒋伏虎将扬州“跨江融合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总结为：变革思维方式，以深化改革为融合发展增添动力；发展现代交通，以互联互通为融合发展畅通道路；强化经济合作，以重大项目为融合发展提供经济支撑；改善自然生态，以秀美环境为融合发展提供保障；提升民生水平，以人民幸福为融合发展确立根本宗旨。国家统计局扬州调查队纪检组长黄祥凤的课题组，提出了扬州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建议科学整合文化创意旅游资源，着力完善基础设施，构建高效公共服务平台，培育创意阶层，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文化创意旅游发展。

六是对扬州文化专题项目的研究。扬州大学教授田汉云主要论述了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尊信“古学”而务求其“是”的学术宗旨，认为这是在王念孙与同辈学者李惇、汪中、刘台拱的治经实践和学术交流中形成、确立的，而由他作出精当概括并大力提倡。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铤则记叙了从丝绸之路来扬州开诊所，寓居三十年并葬于扬州的土耳其医生甘宓特的事迹。扬州大学王宁宁论述了近代扬州的新型知识群体及其文化理想，认为扬州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启了由传统“文士结构”向近代“知识分子结构”的蜕变历程，代表着近代扬州知识界的发展方向。

会议特邀乡贤代表还从不同角度对扬州历史文化、城市精神、民众生活、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探索 and 解读。

（扬州市社科联）

从传播的角度看中国艺术

——2015 年中国艺术海外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郭婧文

2015 年 10 月 10 日到 11 日,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东南大学联合主办,东南大学社会科学处、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中国艺术国际传播战略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的“2015 年中国艺术海外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南大学召开,会议共收论文 30 多篇,来自包括韩国、台湾地区等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海外受众接受中国文化艺术的历史与现状、中国传统艺术海外受众的基本类型、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路径、如何在异质文化圈中讲好中国艺术的故事四个议题进行研讨。会议由王廷信教授主持,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教授致欢迎词,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东南大学社科处处长周佑勇出席会议并致辞。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等也出席了大会。

郭广银书记在致辞中表示,东南大学艺术教育 with 艺术理论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艺术作为跨文化、跨国界、跨地域文明对话的最佳载体,承担了创新对外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希望各代表在此次研讨会上进一步探索把握海外受众对中国艺术的认知方式,探索海外受众认知中国艺术的基本路径,促进中国艺术在世界的跨文化交流。教育部社科司张东刚司长在致辞中指出,当今时代需要文化的力量,应重构人类文明的新秩序,共筑人类精神的新家园。艺术作为一门特殊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东南大学的艺术学科在全国领先,应该在美育工作和海外艺术传播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希望此次会议能汇聚各方力量,提出更多富有创见的思想和成果,推进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树立中国文化的新形象,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交流、交融。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刘德海在致辞中指出,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空前广泛,中国文化既需要在扎根本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滋养,又需要借助合理的路径向世界表达自己的信息。富有独特风格的中国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开明、兼容并蓄的过程,在吸收世界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在海外有着较高的认知度,但这种影响与中国经济的影响力相比还很不足,迫切需要加强和改进。开幕式结束后,各参会代表开始围绕中国艺术海外认知这一主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中国艺术海外传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对其历史的梳理与对现状的分析是研究海外认知情况的基础性要求,这有助于为当下艺术海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助益传播活动的顺利展开。

艺术门类方面,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认为,近30年来,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历史研究最为充分,但这些著述尚非专门性的研究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学术著作,不利于从艺术的角度看清楚中国艺术海外传播过程中的细节。有关具体的艺术门类海外传播的历史著作稀少,也很不平衡,除瓷器、音乐、戏曲等门类的有限著作外,其他门类海外传播的历史研究还很缺乏。有关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理论著作在戏曲、电视、美术领域较多,其他艺术门类还未多见。这种情形一方面与有关艺术海外传播的历史研究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有关艺术海外传播理论队伍研究力量的薄弱有关。台湾中央大学孙玫教授扼要地回顾了中国戏曲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过程,讨论了中国戏曲在西方所产生的其母国所不曾有过的变异和景观。以海外旁观者的身份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戏曲在异质文化圈的变异与形态,有助于我们对传统艺术的海外传播做一番新的了解与思考。韩国全北大学的郑元祉教授细致分析了朝鲜时代即产生的男社堂牌这一传统朝鲜艺术的演出剧目、演出活动以及传承的历史路径,并涉及到东亚各国共同继承的戏曲文化元素传承状况。北京外国语大学梁燕教授以梅兰芳海外演出为观测点,对1919、1924年日本主流观众对梅兰芳演出的反响、1930年美国媒体和学者对其演出的认知和1935年苏联文化界对梅先生演出的接受情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为我们反观传统艺术推介活动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的视角。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王永恩副教授简述了中国话剧传播过程中从“难”到渐渐被国外受众所接受的过程,并着重分析了中国原创话剧走出去的主要途径。大邱大学的金宝敬讲师从多个层面讲述了《顾氏画谱》对朝鲜后期绘画的影响。东南大学李牧讲师借助自身的经验,分析了中华舞狮在纽芬兰的身份认同问题。东南大学郭婧文硕士研究生探讨了中国内地戏曲市场与有效海外传播之间的关系。这些针对不同艺术门类的传播史与传播现状的讨论,对于艺术的海外传播与海外认知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艺术学科方面,南京艺术学院常宁生教授考察了近百年来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和形成过程中,西方学术体系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影响,指出美术史研究必须走出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完成中国艺术史学科现代形态的转化与整合。南京师范大学的王菡薇教授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梳理,认为20世纪早期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海外收藏有着密切关联。强调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逐渐生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与中国本土美术史研究形成了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中国地质大学的方浩副教授基于对2014年度东南大学中国艺术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发布

的“中国艺术国际传播舆情简报”数据分析，认为中国艺术传播过程中传播类别发展不平衡。东南大学李盼君博士提出要将民族艺术构建为赛博空间中的“全球族”。艺术海外传播对于艺术学科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敏锐地发现传播活动对于学科转型的影响。

二、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方式与路径研究

中国艺术海外传播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也有许多需要总结的方法策略。在全球化与大众传媒语境下，如何使中国的艺术适应当下时代的变化，完成有效的传播，是学者们着重关注的地方。

实践经验方面，韩国东国大学的姜春爱教授在大量资料整理后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戏剧在韩国的传播路径。她以贝赛托戏剧节、世界国立剧场节和其他戏剧节为主要分析对象，比较了各戏剧节的传播路径与传播情况，并指出中韩之间构建基础性研究数据库是必要的。天津音乐学院的张蓓荔教授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传统音乐跨文化传播的三个结构性要素，分别是传播的理念及标准、传播的基本路径、传播的方法。张教授以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六年在欧美各主流艺术节、演出季交流、考察的经历，思考与探索了中国传统音乐跨文化传播的有效路径与战略。河海大学周丰副教授分析比较了中西绘画史上对“水”这一符号的不同解读。南京工业大学张安华讲师探讨了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几种不同路径。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李鸿良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探讨了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现状与问题，提出应该以艺术人文情怀传递艺术的美，以艺术的美扩大中国的软实力，在这一过程中也要强调艺术的独特性。各学者以自身丰富的经验为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可参考的、实用的意见与建议。

传播策略方面，中国文联出版社朱庆社长基于互联网艺术资源建设与传播展开讨论，强调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整合中国传统艺术资源，并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希望将尽可能多的专家、艺术家资源采集到素材库，在此基础上推动艺术交流、建立评估模型、保证商业价值，形成一个艺术生态圈。南京大学的周凯教授表示面对拥有丰富资源与深厚内涵的传统戏曲艺术，对其海外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介绍中国传统戏曲海外传播的基本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与当地媒体合作交流、加强本土化传播、创新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品的制作”等传播策略，为中国戏曲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参考。南京师范大学陶小军副教授探讨了近代中日书画市场中交流活动各自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书画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东南大学岳晓英副教授以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和新加坡国际基金会为例，探讨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对艺术传播的重要性。华中师范大学瞿文妍讲师指出大数据时代对本土 IP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意义。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张莹讲师则认为电影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对实现“中国梦”有重要作用。

三、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理论研究

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活动不仅仅是一项实践的过程，我们更需要将视角转换，从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视艺术的相关问题，以此来促进学科的发展与成熟。

韩国大邱大学李吉淳教授认为设计过程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应以中国的中庸之道为支撑，才能有效地促进作品的完成。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梁国伟教授认为中国戏曲以“气”为核心的这种程式化表演，需要以“交感”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在细致分析“交感”传播方式中的传承、观演、传播三方面后，梁教授梳理了戏曲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对人类的生存所具有的价值及其体现。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则从国家战略、实践活动、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对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作出分析。对近十五年的实践活动与近三十年的理论研究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系统的提出了这三个方面各自的特点、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浙江财经大学张波研究员认为海外观众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兴趣与表象认知往往是肤浅、短暂的，引导他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和喜欢中国传统艺术的，应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和意义。南京艺术学院翁再红副教授通过对本雅明的翻译理论的解读，认为从“遴选”到“转义”再到“输出”，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三个相辅相成的阶段，中国艺术的传播应对其有所思考。中国地质大学王安妮讲师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强调了构建舞蹈传播理论的重要性。

在大会闭幕式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黄厚明副院长表示，此次会议覆盖艺术门类广，观点丰富，对艺术学科的发展、建设有所帮助，并祝贺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王廷信教授做会议总结发言，指出本次会议的主题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科背景、学科架构密切相关。选择艺术传播这样一个新的视角，以海外认知这样一个话题来谈艺术，容易发现新观点，希望在大众传媒与经济发展较好的时代下重新审视艺术。此次会议吸引了众多的青年学者前来参加，反映了艺术学科的发展愈加成熟，态势愈加繁荣。